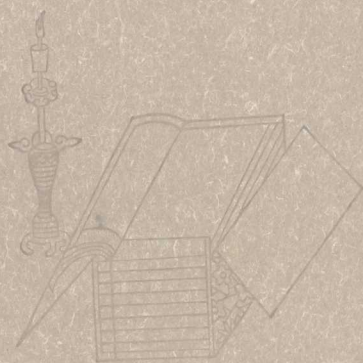


古典文學論叢



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

古典文学论丛

缪钺著 缪元朗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古典文学论从
——



钱著
缪元朗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文学论丛 / 缪钺著, 缪元朗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7

(百年求是学术精品丛书)

ISBN 978-7-308-06694-5

I. 古… II. ①缪…②缪…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383 号

古典文学论丛

缪 钺 著 缪元朗 编

出品人	傅 强
丛书策划	徐有智
丛书主持	黄宝忠 陈丽霞
责任编辑	王 萍
封面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求是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6694-5
定 价	6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前 言

“齐鲁青未了”。杜甫诗中的泰山，一道青绿的山色，绵延齐鲁大地而未尽，是何等的韵致，又是何等的气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缪钺彦威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正宛如青绿的岳色，韵致，气度，与众不同，具有永恒的魅力。

彦威先生的《诗词散论》，是现代学术的经典之作，可以媲美王国维《人间词话》。尤其《论宋诗》、《论词》，讨论中国古典诗词的特质，文思精湛，识解卓越莹彻，笔墨精洁馨逸，处处启人性灵神智，处处令人陶醉流连，几乎不觉其为气度磅礴，涵盖一代一体文学的大著述。请读《论宋诗》：“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就内容论，宋诗较唐诗更为广阔；就技巧论，宋诗较唐诗更为精细。然此中实各有利弊，故宋诗非能胜于唐诗，仅异于唐诗而已。……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故唐诗中深情远韵，一唱三叹之致，宋诗中亦不多觐。”从来论唐宋诗之特质，罕有如此识解卓越莹彻，笔墨精洁馨逸，而又淋漓尽致。

《论词》指出,“词之所言,既为人生情思意境之尤细美者,故其表现之方法,如命篇,造境,选声,配色,亦必求精美细致,始能与其内容相称”,并指出词的特征,第一曰其文小,即意象“轻灵细巧”。彦威先生以秦观《浣溪沙》为例:“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似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然后指出:“飞花自在,而其轻似梦,丝雨无边,而其细如愁。取材运意,一句一字,均极幽细精美之能事。古人谓五言律诗四十字,譬如士大夫延客,着一个屠沽儿不得。余谓此词如名姝淑女,雅集园亭,非但不能着屠沽儿,即处士山人,间厕其中,犹嫌粗疏。惟其如此,故能达人生芬馨要眇不能自言之情。吾人读秦观此作,似置身于另一清超幽迥之境界,而有凄迷怅惘难以为怀之感。虽李商隐诗,意味亦无此灵隽。此则词之特殊功能。盖词取资微物,造成一种特殊之境,借以表达情思,言近旨远,以小喻大,使读者骤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诵之而得隽永之趣也。”彦威先生晚年总结自己平生论词,又进一步指出:“因唱词者多是少年歌女,故词中亦多写男女间之幽怨闲情,其风格则是婉约馨逸,有一种女性美,亦即王静安所谓‘要眇宜修’者也。”从来论词之特质,亦罕有如此识解卓越莹彻,笔墨精洁馨逸,而又淋漓尽致。

《论宋诗》、《论词》如此识解莹彻,笔墨馨逸,与一般现代古典文学研究面目迥然不同,根源之地,在于彦威先生之于古典文学,既具有当行本色,又具有灵光明照。彦威先生《王静安与叔本华》说:“其心中如具有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此亦彦威先生夫子自道也。今举一例。颜延之是刘宋时大文学家。刘宋权臣徐羨之等因猜忌庐陵王刘义真、谢灵运、颜延之持不同政见,将义真出为南豫州刺史、出镇历阳(今安徽和县),灵运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延之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清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近人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据《文选》卷六〇颜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旆旧楚”,以有宋五年为少帝景平二年即元嘉元年(424),认为延之出为始安太守道经湘州(今湖南长沙)是在此年。彦威先生《颜延之年谱》永初三年谱据《宋书》卷三《武帝本纪下》永初三年(422)二月“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邵为湘州刺史”,及《宋书》卷四六《张邵传》武帝“分荆州立湘州,以邵为刺史”,认为刘宋立湘州、以张

邵为刺史是在永初三年,与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旄旧楚”事实相合,“有宋五年”之“五”字当为“三”字传写之误;又据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证明灵运出为永嘉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实在永初三年(422)七月。彦威先生所考精湛致密,具创见卓识。有学者以为“缪说未安”,依据是“《文选》卷五七《阳给事诔》,序云‘惟永初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以是知景平元年延之尚在建康,其出为始安,自是次年事矣。”今覆按颜延之《阳给事诔》序云:“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录旧勋。苟有概于贞孝者,实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可知《阳给事诔》序“景平之元”一节乃追述之词,“元嘉廓祚”一节始是记述作年,延之《阳给事诔》实作于文帝元嘉年间(424—453),非作于少帝景平元年(423),延之出为始安太守亦非在景平二年。学者因为漏读《阳给事诔》序“元嘉廓祚”一节,遂误。由此可见,彦威先生所考实坚确不移。

彦威先生之于古典文学具有当行本色,是说先生本身就是今之优秀古典诗人。今举彦威先生早年、晚年诗各一首,以见其诗造诣之深度,境界之高度。彦威先生1935年所作《乙亥南游杂诗十六首》,其中清华园留别吴宓雨僧诗:“重译赢粮遇硕师(谓美国白璧德先生),十年归国久栖迟。起衰争望昌黎出,正是文章零落时。”结尾二句,从杜甫杰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化出,最是神韵,而完全不着痕迹。应当说到的是,吴雨僧先生晚年巨著《吴宓日记续编》近年已经出版,那是20世纪中国的绝大著作,无愧于唐之昌黎矣。由此可见彦威先生之识人,不仅可见彦威先生诗艺术造诣之深度而已。彦威先生1989年所作《再读〈柳如是别传〉》诗:“三户亡秦愿已空,荒江残垒怨东风。故人慷慨多奇节,心事朦胧似梦中。老去绛云能补过,当年小草苦飘蓬。一生坎坷归何处,双豕虞山夕照红。”陈寅恪先生晚年巨著《柳如是别传》,亦是20世纪中国的绝大著作。彦威先生诗“故人慷慨多奇节”之句,虽然是说钱牧斋,其实亦是说寅恪先生,由此足见彦威先生晚年之思想境界矣。彦威先生本身就是今之优秀古典诗人,故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具有当行本色。曹植《与杨德祖书》云:“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其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其断割。”

犹记昔年侍坐时，彦威先生曾为我吟诵此语，此亦彦威先生夫子自道也。

彦威先生治学，文学、史学，皆有精深之成就。所著《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冰茧庵丛稿》、《灵谿词说》（合撰）等，主编《三国志选注》、《三国志导读》等，皆史学、古典文学研究之杰作。其史学著作，亦与古典文学有甚深关系。即由以上所述，便可知之。

80年代初，我随家父拜谒彦威先生，承先生指教作诗，并谆谆教诲读寅恪先生著作；1985—1986年，我在川大历史系作先生文学助手一年，朝夕承教，受益于先生之学更多，皆永远不能忘怀。今先生《古典文学论丛》出版在即，谨敬述先生古典文学研究之特色，而为此序。

邓小军

2009年3月

目 录

《诗》三百篇纂辑考	1
周代之“雅言”	9
曹植与五言诗体	16
曹植、杜甫诞生纪念	23
《文选》与《玉台新咏》	26
《文选》赋笺	29
六朝五言诗之流变	43
颜之推的文学批评与作品	47
蜀中杰出的古典诗人陈子昂	54
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 ——综述杜甫夔州词	59
杜牧诗简论	66
读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75
论李义山诗	80
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	87
论宋诗	103
论韩偓词	114
《花间》词平议	118
论范仲淹词	129
论张先词	134
论晏幾道词	140

词品与人品

——再论晏幾道	144
论苏、辛词与《庄》、《骚》	154
论黄庭坚词	159
陈师道词论与词作述评	164
论贺铸词	171
论李易安词	178
关于李清照词	182
论李清照词	187
论陈与义词	200
论岳飞词	205
论张元幹词	209
宋词与理学家	
——兼论朱熹诗词	213
论张孝祥词	222
论辛稼轩词	228
论朱淑真生活时代及其《断肠词》	233
姜白石之文学批评及其作品	246
论姜夔词	254
论史达祖词	265
论高观国词	272
论文天祥词	281
论刘辰翁词	286
论张炎词	292
论汪元量词	306
唐宋词中“感士不遇”心情初探	317
论金初词人吴激	326
论元好问词	334
论刘因词	356
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	362
论张惠言《水调歌头》五首及其相关诸问题	368

常州派词论家“以无厚入有间”说诠释	377
王静安与叔本华	382
王静安诗词述评	391
论诗	406
论词	413
论词的空灵与质实	423
达辞篇	430
缪钺年表	434

《诗》三百篇纂辑考

《诗》三百篇如何编定,《史记·孔子世家》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是说也,唐孔颖达,宋郑樵、朱熹、叶适,清朱彝尊、赵翼、崔述、魏源等,皆疑而辨之。以为《论语》记孔子之言,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本谓古人已具之定本,不应指其自删者而言;孔子只有正乐之功,而无删诗之举,至多不过刊定整理。诸家论证详明,无烦重述。孔子删诗之说既未可尽信,然则《诗》三百篇之定本如何纂辑而成, (“诗三百”,乃指成数而言,其确数不可知。汉儒传《诗》三百五篇,孔子所谓“《诗》三百”,是否即此数,亦不可考。)自为一尚待探讨之问题。

《诗》三百篇经秦火之厄,因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少残缺。惟西汉传《诗》者先有齐、鲁、韩三家,《毛诗》晚出,其后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北宋,而《毛诗》独传。三家《诗》篇名章句今犹有可考者,取与《毛诗》对勘,颇有差异。故严格论之,吾人既不能定此四家之本,孰为得孔氏真传,更不能执今《毛诗》以为即孔子所读之本。《论语》记孔子引《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罕》)今《毛诗》中无之。子夏引《诗》:“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八佾》)今《毛诗》无末一句。此皆孔门之《诗》三百不同于今存《毛诗》之证。惟自另一方面论之,《左传》引诗二百七十七条,其间作者自引及述孔子之言者四十有八,而逸诗不过二条;列国公卿引诗百有一条,而逸诗不过五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七十条,而逸诗不过三条。(此魏源所统计,见《诗古微》一《夫子正乐论》中。)此外《孟子》、《荀子》及《礼记》诸篇,所引逸诗亦鲜。故可谓今存之《毛诗》,与孔子所见之本,虽稍有差异,而大体相同,则据今《毛诗》三百篇以

研究古三百篇如何纂辑,或不致大误也。(朱彝尊《经义考》论诗所以逸之故,一则秦火之后,竹帛无存,而口诵者偶遗忘也;一则作者章句长短不齐,而后之为章句之学者,必比而齐之,于句之从出者去之故也。)

孔子之时,已有《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必前于孔子。然则当在何时乎?按《陈风·株林》咏陈灵公事,为三百篇中最晚之诗。陈灵公被弑在鲁宣公十年(前599),下至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孔子生时,(按,此据《公羊》、《穀梁》本《春秋》经。《史记》载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则当为公元前551年。)凡四十七年,再下推至孔子十五志学之时,约六十年。孔子十五志学之时,或已得读《诗》三百篇,则《诗》三百篇之纂定,必在此六十年之内,即最早不得前于鲁宣公十年,最迟不得晚于襄公末年也(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左传》记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观乐,鲁为之歌《周南》、《召南》及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郕诸国风,与今本《毛诗》次第微异,而国名全同,或其时《诗》三百篇已有定本乎?〔《邶风·燕燕》,三家诗说谓卫定姜送其妇或娣之作,约当卫献公初立之时。《列女传》、《坊记》郑注、王氏《诗考》。〕按,卫献公元年为鲁成公十五年,则《燕燕》诗当作于鲁成公之时,又在《株林》之后矣。惟《燕燕》诗就本文观之,仅可知其为送别之诗,无从断其作者为庄姜,或定姜,或其他卫君、卫夫人。三家说亦无确证,故不取,而仍以《株林》为《诗》三百篇中最晚之作。〕

《诗》三百篇之纂为定本,虽在鲁宣公之后,然宣公以前,王朝亦必时时颁诗于诸国,诸国士大夫皆讽诵之,或宴享咏歌,或语言称引,惟所诵者无三百篇之多耳。何以知之?曰:《诗》、《书》、礼、乐,为古代教育之具,而《诗》之用尤广,故两周士大夫无不渐渍于诗教。西周时,祭公谋父谏穆王伐犬戎,已引《周颂·时迈》,芮良夫谏厉王,亦引《周颂·思文》及《大雅·文王》(《周语》上),可见在西周时,《雅》、《颂》已为人所传诵。当春秋前叶,隐、桓、庄、闵、僖五公之时,三百篇中诸诗,有尚未作者;(如秦人赋《黄鸟》,《左传》记于文公六年,陈风《株林》作于鲁宣公时,皆在僖公之后。)有虽作而未必即经王朝纂录颁布者;(如许穆夫人赋《载驰》,郑人赋《清人》,《左传》均记于闵公二年,及经王朝纂录颁布,至早亦应在僖公末年。《鲁颂》乃颂僖公之作,亦未必当时即蒙王朝纂录颁布。《毛序》谓《驹》乃史克所作,则又在僖公之后矣。)而《左传》所记此五公时,列国君卿大夫言语引诗、宴享赋诗者,凡十五条。(《左传》闵公二年记许穆夫人赋《载驰》及郑人赋《清人》,乃记作诗之事,至于“君子曰”以下所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词,均不在此列。《国语》中记东周人士赋诗引诗在鲁僖公以前者,凡十四条。合两

书所记,赋诗之人有楚成王、秦穆公、晋文公、周富辰、郑太子忽、叔詹、陈公子完、齐管仲、晋士蒍、韩简、臼季(即胥臣)、秦公孙枝、宋子鱼、公孙固、鲁臧文仲、齐姜氏等,可见此时各国君卿大夫皆已诵诗。此可为王朝时时颂诗于诸国之证。隐、桓、庄、闵、僖五公时,各国君卿大夫引诗赋诗,就《左传》所记之十五条考之,引《国风》者仅僖公三十三年晋臼季引邶诗“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一条,庄公二十二年陈公子完引诗“翘翘车乘”云云,乃逸诗,不知其应属《雅》,或属《风》,此外皆为《雅》、《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赋《河水》,杜注:《河水》,逸诗。而据《国语》韦昭注,《河水》当作《沔水》,亦《小雅》也。)就《国语》所记之十四条考之,引《国风》者,仅齐姜氏引郑诗“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及楚成王引曹诗“彼己之子,不遂其媾”两条(《晋语》),其余亦皆《雅》、《颂》。由此可见,在春秋前叶,《国风》中诸诗或尚未作,或虽作而尚未经王朝纂录颁布,故传诵于士大夫之口者尚少也。(文、宣、成、襄、昭诸公之世,士大夫引诗赋诗,虽仍以大、小《雅》为多,然邶、鄘、卫、郑、唐诸国风诗,均见征引赋咏,与僖公以前情形不同。)

《诗》三百篇,《周颂》为王朝颂功德祀神明之歌,大、小《雅》除宴享之乐歌外,多王朝士大夫感时讽政之作,献之于天子者,此诸诗自当掌于王朝大师之官。至于诸国《风》诗,如何收集,旧说皆谓由于采诗之制。然采诗制之实况,果如何乎?古书中记采诗制最详者,为班固《汉书》及《公羊传》何休注,而班、何两家之说,即相参差。《汉书·食货志》云:“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艺文志》亦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两家说不同之点,即班书所言,似行人乃王官,直至各国采诗,归而献之大师,而何休所说,则采诗并无专官,由各国自采集之,以闻于天子。二说孰为近真,固难臆断。如进而研究之,古书言采诗之官者,除《汉书》外,如刘歆所谓“道人”(《与扬雄书》),扬雄所谓“輶轩之使”(《答刘歆书》),许慎所谓“迎人”(《说文》第五篇上),皆汉人之说。先秦诸书,未有明言采诗之官者。《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夏书》曰:“道人以

木铎徇于路。”杜注：“遘人，行人之官也。徇于路，求歌谣之言。”据此，则遘人或行人，即古采诗之官。惟细绎之，师旷引《夏书》只言“遘人以木铎徇于路”，未言采诗，而“求歌谣之言”一语，乃杜注所增。《周礼》虽六国时书，然亦多据成制，非尽虚构，其中无遘人之官，而记大小行人之职，亦无采诗一事。《周礼》作者熟于掌故，杂采以前官制而增益弥缝之，不厌详密，以寄其理想。苟王朝有采诗之官，作《周礼》者谅不致删弃。至于“以木铎徇于路”之制，《周礼》中有之，如乡师“以木铎徇于市朝”，乃所以警戒人民，发布政令。木铎警众，盖为古制。然则师旷引《夏书》所谓“遘人以木铎徇于路”，殆亦警戒人民，宣布政令，与采诗无涉。（师旷引《夏书》之语，伪古文《尚书·胤征》篇袭取之。伪孔注曰：“遘人，宣令之官。木铎，金铃木舌，所以振文教。”其义似较杜氏为长。又按《论语·八佾》篇，仪封人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亦谓天将使孔子明道施教，以化天下，非谓使孔子采诗也。）且古者天子与诸侯之关系，非若后世朝廷之与郡县，刑政教令，未能直达，况采诗小事，何劳王官遍游各国，巡行乡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凡王官至鲁，如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赙（隐公元年），武氏子来求赙（隐公三年），凡伯来聘（隐公七年），南季来聘（隐公九年），宰渠伯纠来聘（桓公四年），仍叔之子来聘（桓公五年），家父来聘（桓公八年），祭公来（桓公八年），家父来求车（桓公十五年）等，均书于《春秋》经，独无王朝采诗之官来鲁之事。故吾疑班书说古代采诗制之隆重，不免稍有理想化之嫌。何休所言，或近真欤？

前人亦有怀疑采诗制者，故魏源有霸者陈诗之说，其言曰：“问郑自子产执政以后，褚其衣冠，伍其田畴，海其子弟，风俗大变，而始谤终颂之谣不登于诗者何？曰：诸国之风，皆陈于齐桓、晋文，而桓、文以后，惟秦康公诸诗陈于晋襄，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此外无闻焉。盖晋景、悼连年争霸，不过志在主盟，而采风陈诗之典闋如矣。”（《诗古微》九《桧郑答问》）然魏说似亦有不可通者。《国风》诸诗，除少数有确证者外，颇难考定某诗作于某公之时，或为某事而作。魏源先信《毛诗序》定《木瓜》为美齐桓之诗，（贾谊《新书·礼》篇谓《木瓜》为臣下思报礼而作，与《毛序》不同，盖三家说。朱子《诗集传》则疑《木瓜》为男女相赠答之词，亦颇近情理。）因谓“《卫风》终于《木瓜》，大都皆文公以前齐桓所陈于王朝。”又谓“《卫风》终于《木瓜》，所以著齐桓攘狄之功。”（《诗古微》三《邶鄘卫义例》篇下）《郑风·羔裘》乃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有女同车》、《褰裳》、《山有扶苏》，皆男女情诗，而魏源必谓《清人》以下皆

文公后诗,谓《羔裘》乃美郑叔詹、堵叔、师叔三良所作,谓《有女同车》亦刺文公诗,《褰裳》之狂童、《山有扶苏》之狡童,皆指文公,因谓“诸国变风,类皆陈于齐、晋二伯,而图伯之事,莫大于攘楚,攘楚之事,莫要于服郑,故齐桓陈其诗,自《清人》以下,于文公独详。”(《诗古微》九《桧郑答问》)此种说法,殆皆不免于附会。此其不可通者一也。魏源谓陈灵诸诗,陈于楚庄。楚庄既陈他国之风,何以独不陈其本国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齐桓、晋文称霸之时,鲁、宋两国,列于会盟,奉命惟谨,桓、文陈诗,何以独缺鲁、宋之风?此其不可通者三也。

王朝采诗之制,既有可疑,而霸者陈诗之说,又难尽信。各国风诗之所以搜采而纂辑,盖应据何休之说,乃由各国自行采集而献之王朝者。兹更详细说明之。古代侯国为具体而微之王朝,王朝制度,侯国往往有之,惟较简而已。(西汉初,诸王国制度与汉廷相似,犹存古意。)王朝有献诗之制。邵公谏厉王谓“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周语》)《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右尹子革对楚王,谓“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即献诗讽谏之例。大、小《雅》诗本文中亦多可征者。《小雅·节南山》云:“家父作诵,以究王讟。”《何人斯》云:“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大雅·卷阿》云:“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民劳》云:“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皆王朝公卿列士献诗之证。此种制度,侯国亦应有之。《魏风·葛屨》云:“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陈风·墓门》云:“夫也不良,歌以讯之。”此皆作者自述作诗讽讥之意,与《小雅》“以究王讟”、“以极反侧”,口吻相似。故《国风》中一部分讽政谏君之诗,如郑之《清人》、秦之《黄鸟》,殆皆本国卿大夫所作,献之朝廷,存于大师,此固不劳采访。至于《国风》中之一部分,为里巷讴谣,写民间哀乐,盖出于庶民之手,此种诗非必作者自献于朝,盖由采集而来。任采集之事者,无须特异之才能,故亦未必特设专官也。〔此种采诗之制,盖侯国与王朝所同。《国风》中之一部分,为各国自行采集者。《王风》中之一部分,为东周王朝在其畿内所采集者。《小雅》中如《黄鸟》、《我行其野》、《采绿》、《苕之华》、《何草不黄》等,多里巷讴谣,其体极似《国风》,此盖西周王室在其畿内所采,相当于东周之《王风》,而所以列于《小雅》者,盖以雅本西周王畿内之乐调(本章炳麟《太炎文录·大正小正说》),周人发迹幽岐,建都丰镐,故用其本地音乐为朝会宴享之乐,地位特尊,号为正乐。至如《黄鸟》等

诗,乃西周王畿民歌,自应以其本地乐调歌之,故不必特称某风,而即可列于《小雅》中矣。〕或曰:各国风诗,一部分为士大夫所献,一部分由采集而来,保存于本国之乐官,既可知矣。而侯国献诗王朝之制,除何休之言外,又何从得更古之证明乎?曰:《鲁语》闵马父谓:“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王国维释之曰:“考汉以前,初无校书之说。余疑《鲁语》‘校’字当读为‘效’,效者,献也,谓正考父献此十二篇于周大师。”(《观堂集林》卷一《说商颂》)按王氏解“校”字义甚精确。且《商颂》非商代之诗,乃宗周中叶宋人所作,故《商颂》即宋颂,王氏《说商颂》中亦证明之。由宋正考父献其本国颂诗于周大师之事推之,则各国亦均可有献诗之举,更证以何休记采诗制“国以闻于天子”之言,其事益明,而各国风诗集于王朝,即以此故。(朱熹《诗集传·国风》注曰:“诸侯采之以贡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于乐官。”是朱子之意亦以为各国诸侯自采其本国之诗而贡于天子也。)此说可以解释数种疑问。第一,楚亦春秋时大国,《诗》三百篇何以独无楚风?曰:非以楚国无诗,盖楚虽有诗,而未尝献于王朝,故周大师无从纂录也。楚僻居南服,自称“蛮夷”(《楚语》、《史记·楚世家》),而中夏亦以“蛮荆”(《诗·小雅·采芣》、《吴语》)、“荆蛮”(《晋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目之。楚不但自称王,且观兵雒郊,问鼎轻重,其视王室,蔑如也。凡诸侯承奉王朝之礼制,楚皆无与,献诗之事,遂亦缺如。第二,宋、鲁两国,何以无风,而只有《商颂》、《鲁颂》?曰:若果由天子命行人之官至各国采风,则宋、鲁两国,不当遗漏,正因各国自献其诗,故有参差。盖宋为殷王之后,鲁乃周公子伯禽所封,此两国皆可用天子礼乐,异于他邦。故荀偃、士匄曰:“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颂为天子之乐,诸侯中惟宋、鲁能用之,故宋、鲁两国只献其颂诗以自表异,而不献风诗,周大师就其所献者而编录之,此宋、鲁之所以无风也。第三,《诗》三百篇何以止于陈灵,岂陈灵以后即无诗乎?曰:观《左传》襄公四年所记鲁人之歌臧纥,襄公三十年所记郑人之歌子产,昭公十二年所记南蒯乡人之歌,知陈灵以后,未尝无诗。而《诗》三百篇所以止于陈灵者,盖周室东迁,威灵虽损,而齐桓、晋文创兴霸业,犹以尊王相号召,各国亦推奉王室,献诗之制仍存,桓、文既歿,诸侯强恣自雄,尊王之心益泯,故不但楚国不献诗,即中夏诸侯,亦废此制。太师编录,止于陈灵,三百之篇,遂为定数矣。

当陈灵以前,献诗之制犹存,诵诗之风甚盛,各国风诗,自作成之后,

迄于纂录于王朝，传诵于诸国，为时并不甚久。举一事以明之。《邶风·载驰》乃许穆夫人所作，《左传》记于闵公二年，而据魏源考证，此诗应作于闵公二年之次年，即僖公元年。（《诗古微》八《邶邶卫答问》：“郑笺以‘归唁卫侯’为戴公，然狄以闵二年冬入卫，宋桓公立戴公以庐于漕，甫一月卒，安有芄野之麦，采丘之蕝，其作于次年文公初立，楚丘未成之时乎？”）其后四十五年，即鲁文公十三年，郑伯与文公宴于棐，郑子家已赋《载驰》之四章，义取小国有急，欲引大国以为助，鲁季文子赋《采芣》之四章以答之。（《左传》）可见其时《载驰》一诗必已见录于王朝之大师而颁布诸邦，传诵人口，故会盟宴享之际，赋诗者举其辞以见志，而闻之者即知其意而答之也。唐宋两代文物昌明，楮墨利便，旗亭赌诗，标之涣之警句，井水饮处，歌屯田之乐章，后人歆其韵事，播为美谈。春秋之时，舟车之利，书写之便，远逊后世，而一诗脱稿，竟能于三四十年后，传诵诸邦，歌咏坛坫，文雅盛况，千载同符，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

陈灵以降，不但献诗制度，诗多散亡，即诵诗之风，亦不能久延。观《左传》所记，成、襄、昭三公约八十年中，各国君卿大夫宴享赋诗言语引诗之风甚盛，而定、哀两公四十二年之中，引诗赋诗者仅七条。（定公四年，楚郈公辛引《大雅·烝民》，秦哀公赋《秦风·无衣》；定公十年，鲁驷赤引《唐风·扬之水》；哀公二年，晋乐丁引《大雅·绵》；哀公五年，郑子思引《大雅·嘉乐》及《商颂·殷武》；哀公二十六年，鲁子赣引《周颂·烈文》。此外君子曰引诗，乃《左传》作者之辞，不在此列。）盖世尚征战，文教渐衰，顾炎武论周末风俗，谓：“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日知录》卷一三）慨然于世运之变。实则不待七国，定、哀之间，引诗赋诗之风，已渐消歇。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四十岁以前，当昭公之时，犹及见诗教盛世，至其晚岁，世运潜移，观《论语》中屡记孔子劝人学《诗》之言，或以时人已非复若曩昔之重诗，故谆谆言之欤。

总之，《周颂》与大、小《雅》，多王朝歌颂功德及祭祀宴享之乐歌与士大夫所献之诗，而其撰作时代多在西周，自应早为王朝大师所纂录而颁布于诸国，此外各国之诗，率由本国收集而献于王朝，录于大师者。《周南》、《召南》为南国之诗。南国非一国之专名，乃一区域之名。据近人研究，周之开辟南国，在西周中叶以后，而至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南国诸侯渐为楚所并。二《南》诸诗，殆此百余年中陆续所献。其余各国风诗，亦各国陆续献于王朝，王朝大师因而编录之。鲁、宋两国仅献颂诗，而不献风诗，